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初期传播

(20 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创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理论财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适应了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和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先后是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初步传播；五四时期至中国共产党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过程中，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围绕着“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无政府主义问题”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归根到底，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经过论争，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不仅战胜了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思想，而且也战胜了传入不久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此，中国人民有了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工具，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先进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哺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迅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基本条件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一定时代自然、社会和思维矛盾运动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它的产生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它的传播和发展也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是由当时特定的条件决定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社会条件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①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使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按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逐步发展，必将瓦解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基础而导致社会性质的改变。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工场手工业对封建制度有很大的依赖性，这些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十分缓慢，还没达到足以根本改变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程度。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以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对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起了迅速的瓦解作用。一方面，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它们向中国倾销大量的廉价工业品，从而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加速了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另一方面，又给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大量农民和手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26页。

工业者破产，又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因此，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已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发展，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些变化说明中国社会已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它已开始逐步变成半封建社会。

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变中国为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了这个目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采用了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它们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强占中国领土，索取巨额赔款，强迫中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中国建立租界、驻扎军队及领事裁判等政治特权，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使中国丧失了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强行开辟许多通商口岸，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外贸；开设银行，垄断中国的金融和财政，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成为其经济附庸。它们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工业企业，直接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极力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使中国社会又具有了半殖民地的性质。

随着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鸦片战争后，不仅原有的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还增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①

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也就使此后的中国革命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631 页。

具有了新的性质。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革命，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单纯农民革命。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的任务对外是推翻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民族革命，对内是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这就决定了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十月革命以前，这种革命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十月革命以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从革命的阵线上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①了。

上述种种变化，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社会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阶级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只是适应了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需要，还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了一个新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本质上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思武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急迫地要求有一种革命的科学理论来武装自己，指导争取解放的实践斗争。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正是适应了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的时代需要。

中国无产阶级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劳动阶级，它不但和那些与落后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劳动农民不同，而且与中国现代大工业出现前的各种手工业工人不同。它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先进阶级。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之外，还有它的许多特殊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它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受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这些剥削和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

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更坚决、更彻底。

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部分是从破产农民转化而来的，所以他们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数量不多，但集中的程度却很高，同分散的、从事手工操作的其他城乡劳动者相比较，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是他们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斗争中革命力量最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无产阶级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五四”运动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成为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也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需要科学理论来指导，这样便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新局面。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真理，进行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

综观鸦片战争以后几十年的历史进程，整个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对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上的探求和选择。但是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期 不论是 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 还是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都没有也不可能帮助中国人正确解决这一问题。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一度兴起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力图摆脱东汉古文经学和宋明理学那种脱离现实的烦琐考证的束缚，使自己的研究比较切合实际。龚自珍和魏源就是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龚自珍在哲学上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孟子先验的性善论和那种颂古非今、复古倒退的唯心史观都有所批判。这是和他在政治上揭露封建社会、要求变革现实相一致的。但是，龚自珍毕竟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为封建社会寻找起死回生之术。因此，他在批判天人感应论的同时，又把天人之间的沟通寄希望于圣人的出现；他在批判先验的人性论的同时，却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他在

宣传历史进化思想、反对复古倒退的历史观的时候，又强调事物的本体是永恒不变的，并宣扬历史循环论。

魏源经历了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历史带来的深刻变化，从而在政治上提出了反对侵略、要求改革的进步主张。这是同他在哲学思想上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密切联系着的。魏源在知行关系上继承王夫之、颜元的“行先知后”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思想，在历史观上也提出进化的思想，反对复古倒退的论调。但是，魏源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还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还迷信宗教鬼神之说，肯定鬼神之说在维护封建统治、辅助王法上有特殊的作用。他的历史进化观点也是在肯定“道”不变的前提下提出的。魏源所谓的“道”仍然摆脱不了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纲常关系。因此，他的社会改革思想毕竟是有限的。

龚自珍和魏源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样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许多先进人物所面临和继续探索的问题。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是在鸦片战争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条件下，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但是当时洪秀全能够从西方接触到的只是基督教教义而已。长期生活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农民，无论从思想或感情来说，都深受宗教的影响，从而使洪秀全能够利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建立“拜上帝会”这样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农民革命组织，并发动农民革命运动。洪秀全借以动员农民群众向封建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正是以宗教为外衣，以实现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等的社会为目标的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是同当时农民所处的物质生产条件，同他们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对革命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相适应的。因此，它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空想，也恰恰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弱点。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上的革命思想，根本不可能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中国加速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出生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年代的康有为，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下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又一个代表人物。他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不仅继承了早期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思想，而且把改良主义思潮直接转向实际的变法维新运动。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对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对于人民群众怀有恐惧，他的改革只能是带有温和色彩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这种软弱的维新运动，在封建顽固派的打击下，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是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需要相适应的。他把儒佛两家的哲学思想同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人性论和空想社会主义揉合在一起，最后在他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中反映出来。康有为所写的《大同书》既是他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反映也是他目睹资本主义危机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的反映，是他集中国和西方的一切美好设想而描绘的一幅理想的蓝图。但是，他所设想的“大同之世”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他根本看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离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唯心主义地把实行君主立宪作为达到“大同”的必由之路。毛泽东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①他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成为前进的绊脚石，从资产阶级维新派转而成为保皇派，绝不是偶然的。

直接参与康有为变法维新运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严复。他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吧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严复在维新运动中主张效法西方，提高民权，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他还通过介绍生物进化论，宣传“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但是，严复并没有根据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得出相信群众和废除封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71 页。

建君主制度的结论。他仍然认为人民不能自治，需要“圣人”去“开民智”，把希望寄托在“圣明君主”身上。严复也没有看到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他用进化论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这种简单比附当然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严复虽然承认历史要“变”，但这种“变”既不是阶级斗争，更不是社会革命，只能是一条排斥质变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这种庸俗进化论和社会改良论的思想，必然同日益发展的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格格不入，不可避免地要同旧学相妥协，向封建主义倒退。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孙中山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曲折的过程。他在早期曾上书李鸿章，力求仿效西方，实现资本主义改革。到这种上书游说活动四处碰壁后，他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建立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随着改良派在戊戌变法中的失败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从而使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引起人们愈来愈多的注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的思想分歧也经历了一个从逐步加深到公开论战的过程。最初，孙中山曾幻想过同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合救国”，但是这种幻想随着改良派日益嚣张的保皇和反对革命的活动也就破灭了，孙中山从事实中看到他们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清王朝更甚。深刻的思想分歧要求划清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线，于是一场公开论战在孙中山等人的推动下广泛展开了。

20 世纪初展开的这场大论战，是围绕着旧民主革命的纲领而进行的。革命派在论战中所凭借的武器，是废除清朝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土地国有。这场论战对于旧民主革命的高涨、辛亥革命的爆发，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三民主义学说也是通过这次论战系统地提出来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针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满族封建贵族统治而提出的，民族革命就是以推翻满清政府为目的的；他的民权主义是针对封建帝制而提出的，民主革

命就是以反对帝制、建立民国为中心口号的；他的民生主义是针对社会状况而提出的。社会革命就是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的。这些思想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要求，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特点。但是，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决裂，也不可能解决反帝反封建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任务。旧三民主义的这种根本缺陷，孙中山是在不断失败、不断探索中逐渐认识的，而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又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孙中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就世界观来说，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孙中山在世界观上推崇进化论，而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认识论上注重事实和经验，但他的“知难行易”说又割裂了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存在着二元论的偏向；在历史观上提出“民生史观”，表现了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却又宣扬了阶级调和论，陷入唯心史观。这一切，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矛盾以及处在这个矛盾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反映。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段历史过程来看，正如毛泽东所概括的：“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①这种历史情景说明，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通过前后相继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尝试遭到失败以后，不得不开始越过资本主义的文明，另找出路，作新的探索，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第二节 20 世纪初马克思学说 在中国的传播与介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是作为一般外来新思潮在那些为谋求国家的振兴和发展的先进知识分子中发生影响的。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马克思学说已经由一般知识分子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传入中国了。只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成熟和最初传播马克思学说的人们本身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的范围还不是很大，人们对它的理解也不甚深入，更谈不上发挥实践的作用。但是，这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却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后来大规模和实质性的传播起了某种思想先导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最初影响的传入到后来的传播工作，先后是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进行的。

一、马克思学说的初期传播

（一）马克思著作的翻译与介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我国社会大变动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命党人不屈不挠，英勇斗争，成功地进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社会的大变动是与思想的大解放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时期，一些思想家们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兴起了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马克思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传入了中国。

马克思学说是通过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逐渐传入中国的。20 世纪初特别是 1902 年至 1903 年间，中国留日学生掀起了译介日文社会主义著述的热潮。这些译著使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了最初的传播，也使科学社会主义得到了初步介绍。其中，幸德秋水、福井准造、村井知至等人的著作不仅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内容集中，观点鲜明而且包含着比较深刻的哲理 在中国影响甚大。

幸德秋水的《广长舌》一书 是一部宣传社会主义的通俗读物。它

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含义和目标，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及其实现的必然性；驳斥了反社会主义的观点。该书认为，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自由竞争主义转为资本合同主义。由资本合同主义转为世界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者，特吾人世界社会主义之导火线耳。吾人于二十世纪之前半，必将更组织世界社会主义以代帝国主义并扫去其一切毒弊”。该书认为“革命是社会进化、发展之必经的途径。该书引马克思说‘革命者进步之产婆也’‘革命不是‘不敬’不是‘谋叛’不是‘飘逸’而是人类进步之急切关头’”，世界之公理”。革命虽然可分为‘平和’的和‘猛烈’的但其目的都‘在组织新制度以替代旧制度’”。该书强调指出：“进步与革命，有相倚相待之势。革命之所在即进步之所在”。该书在驳斥所谓社会主义为‘破坏主义’的论调时，着重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及其理想的实质。它认为，布新必须除旧，社会主义之功用性质与今日社会状态“有急要适切之关系”社会主义之发达“为20世纪人类进步必然之势”。

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是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著作。它依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本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读物，无论是在当时的日本，还是在当时的中国，都是一部水准最高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

《社会主义神髓》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析了劳动者贫困的原因，说明了社会主义之本旨。该书认为，劳动者贫困的根源是没有土地和资本，惟有出卖劳动力，以纳资本家之囊筐，献地主之仓库。因此“惟有移地主资本家之一切生产机关为社会人民所公有而已”。非此则不足曰社会主义，知此则可言社会主义之神髓”。

该书还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和矛盾冲突，认为随着产业革命所带来的近代工业的发展，社会分裂为两大阶级：尽领有其生产之地主资本家与食力以外，一无所有之劳动者。“彼疆尔界，鸿沟截然。此社会生产与领有之间，已现地主资本家与赁银劳动者之冲突”。私人占有与自由竞争的结果“继现有组织之工场生产与无政

府之市场之冲突”；矛盾之极者 冲突生焉。冲突之极者 破坏生焉。今之产业方法，既以矛盾始其运行，次则有阶级之冲突，次则有市场之冲突 终以酝酿成产业制造全体之大破裂”出现经济危机。资本家终于不能驾驭劳动者之生产力，“而劳动者挟其蓬勃之生产力，排除现时之制度，脱逸私有者之羁轭，以成社会全体之公益，实是世界产业史进化发达之大势也”。

该书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及其主张的科学性。它指出：“夫事降则杀 剥极必复 乃运会之常期 亦品物之恒理。譬夫花瓣绚烂，终必零落 卵壳圆润 经久破坏。亦惟零落 甘实是结 亦惟破坏 新维方出。”社会之产业组织 亦是如此。这种“事降则杀 剥极必复”之“运会之常期”和“品物之恒理”；明进化之公理 示必然之趋向 促人类之进取 证社会之快活”。现时生产交换之方法 所谓资本家制度者，已达极点”；则可知社会主义之主张 实科学的也”。也就是说 社会主义既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极点的结果，它是合乎社会进化公理的 因此 它不仅是必然的 其主张也是科学的。

1903年2月，广智书局出版了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这是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概况的第一部著作。这部书明确地认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和路易·勃朗、蒲鲁东的学说都是“空想的学理”和“儿戏的企图”其实行也“实属梦想”。只有马克思等德国社会主义“其学理之论据 最为坚固。故其势力 至今日而不衰”。马克思等德国社会主义“其学识之深远 其思想之精致 与从来之社会主义者 大异其趣”。该书专辟一章 介绍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的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 赞扬马克思为“一代之伟人”；其议论之精致 为天下所识认”他“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而《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 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 为研究服膺之经典”。

这些译著表明，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开始了最初的传播，其中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社会进化思想，并涉及到唯

物史观的某些基本观点。

(二) 社会主义学说的初步宣传

在大量翻译社会主义著作的同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初步宣传。这种宣传同样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十一期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他认为社会主义乃“奇伟光明之主义”它发源于圣西门、傅立叶，中兴于路易·布朗、蒲鲁东，极盛于拉萨尔、马克思。“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

马君武概述了“人群竞争”，说明了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关系。他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学说与达尔文不同，但是“马氏之徒谓阶级竞争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故社会主义者，不惟不与达尔文主义相反对，且益广其界而补其偏”。他不仅强调人类争取自己生存的斗争和社会的竞争与进化，而且在阐述这些思想时明确提出“与天争”的口号。他还提出：“英雄造时势乎，时势造英雄乎，时势与英雄，固互相造也。组织最善之社会，必能多出最奇伟、最雄大之个人。此个人既出世，又必能为社会增无限力量”^①。

1903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②，他用中国文化对社会主义作了解释，把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上的井田制和均田减赋一类主张混为一谈。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概指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万物价值之源泉”这是“吾中国固夙有之”。王莽的“分田却假”此即以田主、资本家为劫盗之义也。而苏洵所说：“自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富民“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田主日累其半以至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又与国际工人协会宣言书“何其口吻之逼肖耶”？因此“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

林代昭等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林代昭等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针对梁启超的这种附会，同年5月，《大陆报》发表《敬告中国之新民》^①，认为梁启超是把近世社会主义混同于许行之术，是在承认私有基础上反对剥削。该文强调指出：“社会主义为前世纪以来最大问题而实为大中至正、尽善尽美、天经地义、万世不易之道，岂有如许之说者乎？社会主义在昔日为空论，在今日则见诸实事。虽今日尚不能尽行而他日则期于必行”。该文认为梁启超“大同、小康之说”不绝于口而竟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早期宣传表明，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已经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虽然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是，它对于马克思学说是持欢迎态度的。同盟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和学说的同时，热情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资产阶级革命派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代表是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胡汉民和孙中山等。他们当时所发表的文章，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文献。

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连载《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他不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传略，而且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要点。他指出：“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他不仅高度评价《共产党宣言》而且称赞《资本论》认为马克思在学理上之论议“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社会学者所共遵，至今不衰”。

1906年，宋教仁在《民报》上发表经他略加修改的译自日本的

《万国社会党略史》一文。这篇文章概述了第一国际的历史，介绍了第二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说明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阵势以及马克思学说的意义。它认为，现在世界之人类形成了两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即“富绅与平民”。这二大阶级“一若涉天堂，一若居地狱。不有以救之，世界人类其尽为刍狗矣”。这种阶级的对立和悬隔必生阶级斗争。且已进入两阵之间“旗鼓堂堂，为执戈立矛”。虽然富绅者“有政府、警察、军队、学人、僧侣等为之援助也”，但是“平民”幸而蚁集，幸而得多数。是即至优强之势力也。其结陈而进战也，可决其必得战利品耳”。而从《共产党宣言》则可观“万国社会党之大主义矣”。它指出：“万国劳动者同盟，实由于马尔克之指导而成，而亦为经济的情势必然之结果也”。

1906年，廖仲恺发表了他翻译的《社会主义史纲》和《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分期，说明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初步涉及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史纲》认为，若考近世社会主义之起源，则不能不究其哲学。社会主义乃“为人道而运动”，德意志之社会主义虽云物质的，然马克思、拉萨尔、巴枯宁其所传社会主义之哲学，则发源于黑格尔和费希特。而社会主义之所以登上历史舞台，爱他心虽“为一大原动力”，但其机会则与产业革命纵横并起。因此，“社会主义者即于过去百五十年间自产业上大革命所生意外之结果也”。它对社会主义哲学的这些评述，虽然并不准确，但却表明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已趋深入。《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全为异质者”。一方面，二者之哲学根据相异。无政府主义可分为个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无政府主义，其哲学的根据在个人之主权。社会主义则“善自思维”，认定人“必生长一民族、一社会之中”；自此事实之认识而出发改良其制驭此社会组织者，而与人自由”。因此，若论实际，社会主义比无政府主义“更可信其确保个人之自由”，无政府主义“不过哲学的空想”。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其手段更为背驰。社会主义者，为欲得自由宜利用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则欲废

绝国家”。虽然“究极之目的”二者可谓无不同，即“皆以求个人之最完全的自由者也，惟其间方便法门自成蹊径”。二者的方法手段“真有黑暗与光明之别矣”。

1906年到1907年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在东京进行了一场思想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设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①，但又包含着一般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即如何认识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又是后来一度发生的社会主义论战的开端。

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著名代表梁启超，1903年夏秋间出游美国，回国后于1904年3月发表《新大陆游记》。一方面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分配不均，两极分化，人们成为机器之奴隶等等弊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所谓“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崇拜与信奉“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之著述“其不过是一种‘迷信’”。梁启超在1906年3月发表的《开明专制论》中大力描述社会革命的可怖，并攻击孙中山同盟会是“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漫，而复从而煽之。”这必然使国家“亿劫不可复”。因此他表示：“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梁启超表示了坚决反对社会革命的立场。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梁启超的挑战进行了反击。

1906年6月朱执信发表《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阐述社会革命的含义，驳斥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诋毁。他指出：“社会革命者，于广义则凡社会上组织为急激生大变动皆可言之。故政治革命亦可谓社会革命之一种。今所言者，社会经济组织上之革命而已，故可谓之狭义的社会革命”。因此“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当并行者，

^① 林代昭等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吾人所夙主张者也”。

朱执信阐述了社会革命的原因及其不可避免性。他指出：“社会革命之原因在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凡自来之社会上革命，无不见其制度自起身者也 此必然之原因也”。而今日一般社会革命原因中最普通而可以之代表一切者？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制度也，今日之社会主义，盖由是制度而兴者也”。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把社会革命“归于社会贫富悬隔而起”但是 第一 贫富悬隔是“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之结果”即是说，“求其本原”贫富悬隔与绝对承认私有制度具有“必然之关系”第二 社会革命“非夺富民之财产 以散诸贫民”其“真义”乃在“取其致不平之制而变之 更对于已不平者 以法驯使复于平”由此 虽未至贫富悬隔 也可为社会革命 第三，“社会革命尚有不因于贫富悬隔者”它也适用于“往代之经济制度变更”包括封建时代经济制度之变更。朱执信认为，上述第二、第三两项均适用于中国。朱执信还进而从革命的主、客体关系上论述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的合理性，反驳了梁启超所谓不能并行之说；此外，他还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速行社会革命”的各项条件 等等。朱执信不仅有力地驳斥了梁启超反对革命的主张，而且对马克思社会革命的学说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他的文章体现了应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观察问题的意向。

1906年9月 梁启超又发表文章 不仅对朱执信进行反驳 而且针对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反对革命的主张。他说，他本人介绍社会主义学说 谓经济革命不能避免者 乃“就泰西论泰西也”；社会主义学说 其属于改良主义者 吾固绝对表同情 其属于革命主义者 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 而谓其必不可行 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他的中心思想是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不可行社会革命，不能行社会革命。

1907年3月 胡汉民发表《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的长文 全面反驳梁启超的观点。

胡汉民揭露了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问题谬误的“总根本”。他认为，“梁氏致误之总根本 在不识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为何